



孔子研究院

English ▶

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



本院概况 | 新闻动态 | 学术研究 | 学术交流 | 专家风采 | 本院学刊 | 儒学资讯 | 儒学大会 | 收藏展览 | 网站公告 | 政德教育 | 儒学普及 | 春秋讲坛 | 本院新著

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 | 世界儒学文献收藏中心

儒林新声

您现在的位置 : > 儒学资讯 > 儒林新声 >

- ▶ 儒学动态
- ▶ 儒林新声

微信公众号



网站公告

孔子研究院餐厅工程建设项

一、采购人：孔子研究院 二、采购代理机构：山东九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、...

孔子研究院餐厅设备采购项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：孔子研究院餐厅设备采购项目(二次) 二、采购项目编号...

本院简介

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（国办函〔1996〕66号）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，副厅级建制。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，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。2013年11月26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，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[更多]

最新发布

- 中外青年学者文明对话暨泰 [07-14]
- 孔子研究院“七一”走访慰 [07-01]
- 孔子研究院党委举办“我来 [06-29]
-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 打造 “ [06-20]
- 孔子研究院举办庆祝建党 [06-17]
- 书讯 | 《治道：概念·意义 [06-14]
-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与山东广 [06-12]
-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2022年“文 [06-12]
- 深耕“两创”，让优秀传统 [06-08]
-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| 孔子研 [06-06]
- “《春秋》三传会读”工作 [05-31]
- 第二届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 [05-23]
- “重思中学与西学路径问题 [05-17]
- 《爱的语言，家庭关系密码 [05-05]
-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刊物 [04-29]

推荐阅读

“大德” “小德” 辨

发布日期: 2022-07-20 浏览次数: 93 来源: 《学术界》 作者: 吴天明

摘要：阶级社会的治国之道，孔子认为只有两种：一是夏商周六君子的治国之道，聪明智慧，公道公平，利人利己，君子获取私利的方式和尺度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，故其人为“知（智）者”，其行为“利仁”，其德为“大德”。二是春秋君子的治国之道，客观上或许利国利民，但主观上本质上均极其自私自利，愚蠢虚伪，主要表现有四：或醉心于小名声小成绩小长处，或仅仅忠于职守，或恪守礼仪而不知大义，或仅仅修身齐家洁身自爱，故其人为“君子而不仁者”，其行为“强仁”，其德为“小德”。“大德”方为万世不变的治国之道，“小德”虽可迷惑自己和他人，却不可能真正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。以最近几千年中国治国实践而论，孔子所论不虚。

在“天下为家”时代，君子道德有大小之分，“大德”特指仁德君子造福苍生的治国之道，“小德”特指自私自利、不仁不义君子的若干小长处，孔子称后者为“君子而不仁者”。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这是孔子的见解，也是中国几千年来辨别真假君子的基本标准，至今仍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，故需仔细辨析。

一、“大德”的本质特征和主要成因

国家治理固然无比复杂，原理却非常简单：创造利益，分配利益，务必公道公平公正。孔子认为夏商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治国之道很简单：他们都想为自己谋取巨大而长远的私利，但都明白一个挑战自私自利人类本性的道理，君子必须与芸芸苍生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，真心实意为苍生谋取公利，君子自己才能顺利获取私利，而且获利尺度和方式都要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，苍生公利和君子私利才能都有保障。孔子称这种聪明智慧、利人利己的治国之道为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称赞六君子其人为“知（智）者”，其行为“利仁”，其治国之道为“大德”。

孔子总结的六君子治国之道，与夏商周“天下为家”的社会现实，与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，明显有矛盾。笔者认为，孔子所论六君子之道，既与三代历史有关，又与三代历史无关，其实是孔子熔铸了三代历史和自己的政治智慧、政治理想，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崭新的理想的治国之道，用董仲舒的话来说，“孔子立新王之道”。

下面先从三个方面，简单谈谈孔子所论六君子之道，如何与三代历史有关。

其一，与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有关。蒙文通先生《古史甄微》、徐旭生先生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均发现，中国新石器时代即已初步形成西北羌戎、南蛮和东夷三大族系。夏商周进入青铜文明时代以后，华夏民族又进一步融合，例如三代天王都分封五帝子孙做诸侯，商封夏人子孙，周封夏商子孙，先秦文献均称“赏善”，案例甚多。华夏民族的大融合，除了与进入父系社会，必须实行族外通婚有关以外，与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、一望无际、土壤肥沃、气候适宜，非常适合“刀耕火种”，非常有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冲积平原关系密切。春秋时代以前，许多氏族部落先后都发展到这里。但黄河冲积平原有两个致命缺陷，一是黄河落差突然变小，水利水害并存；二是无险可守，防范游牧民族抢掠是个难题。各氏族部落必须团结一心，守望相助，方可享受黄河之利，避免黄河之害。据《礼记·明堂位第十四》记载，三大族系在周初已大体融合为华夏民族。即使当时经济文化大大落后于华夏

“《春秋》三传会读”工作	[05-31]
“重思中学与西学路径问题	[05-17]
孔子研究院举办“易学与中	[10-27]
“《孔子家语》与中国文化	[10-16]
《孔子家语》研究开启新篇	[10-16]
“国学经典与儒家治道”工	[08-31]
“孔子思想与历代中国”项	[08-19]
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	[08-03]
孔子研究院易学研究中心成	[05-17]
“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与中小	[05-13]
泰山学者“自然与人伦”工	[05-11]
二〇二一年五一节《春秋	[04-30]
孔子研究院举办“儒学思想	[12-22]
“儒学与实用主义对话”学	[12-22]
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	[11-27]

的蛮夷戎狄，也与华夏多有血缘、地缘、语言、历史文化、经济等方面的联系。这就是说，六君子治国之所以情愿公道公平，利人利己，重要原因之一是，他们治理的其实大都是自己的亲族、戚族和邻居。《明堂位》记载，周公平定东夷叛乱后，在明堂召见的天下诸侯，包括周家诸侯，古老文明氏族的诸侯，蛮夷戎狄的诸侯，这说明当时政治、军事已经统一；周公制作礼乐，说明当时政治、宗教、礼乐制度开始统一；周公统一度量衡，说明当时经济开始统一；此外《国语·鲁语下》记载孔子祖先正考父找周太师校阅《商颂》音律，《论语》记载孔子在正式场所说“雅言”，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平日说“吴依软语”的吴国公子季札欣赏用“雅言”演唱的“周乐”毫无问题，可知周代推行普通话已久且成效显著，这是天下文化融合的重要证据。这就是说，六君子治理的主要是正在不断融合的亲族、戚族和邻居，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，正在逐步形成血缘、地缘、经济、语言文字、历史文化、政治、军事上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，六君子治国具有公道公平、利人利己的“大德”，并非完全不可理解。

其二，与商周实行宗法制、君子治理的平民百姓大多是自己的远亲有关。贵族妻妾众多，子孙自然就多，为了有序传承权力和财富，防止父子兄弟自相残杀，荼毒生灵，殃及自身，大约商朝晚期开始尝试实行“宗法制”，规定每位贵族只能有一位嫡妻，立一位宗子（通常是嫡长子），宗子才能继承君父的政治、宗教、经济权力，余子全部下降一档分封。周初再次确认，周公带头遵守，这一制度一直影响到清末。于是历代贵族的绝大部分子孙，都被不断有序边缘化，并最终成为平民百姓，宗法制遂成为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。即以今天中国人口形势而论，中华民族十几亿人，至今还在使用的姓氏大约为两万四千个，其中大约八成人口的祖先，历史上都曾经是大贵族，他们总共使用的姓氏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个。这就是说，周代君子治理的平民百姓，其实大多是自己的远亲，包括亲族和戚族。周史记载，朝堂宗庙不能决断之事，包括立君、国危、迁都，最终都由“国人”决断，“国人”就是一国首都及其郊区的平民百姓，他们大都是天王或诸侯的远房本家，他们不仅最终决断国家大事，还是国家军队的主力，必要时他们甚至愿意为国家而死。所以六君子治国，比较注意照顾自己的远亲“国人”的利益，与自私自利的人性并非绝对矛盾。

其三，与三代君子明白只有认真“立人”“达人”才能最终“立己”“达己”的道理、善于兼顾个人私利与天下公利的聪明智慧有关。大禹时代即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，社会自然财富大增，剩余财产增多，于是人类的自私自利天性得以释放，“天下为家，人人为己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要后世君子像尧舜那样不染指天下利益，已不再可能。大禹治水，启灭有扈，商汤灭桀，纣醢文王，周武伐纣，周公摄政，固然有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的考虑，但未必就没有为自己和子孙后代谋取私利的考虑。三代仁德君子兼顾个人私利和苍生公利的这种聪明智慧，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中华民族开创了最伟大的政治传统，成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伦理学和政治哲学。

总之，黄河中下游广袤的冲积大平原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大融合，实行宗法制又让贵族与平民不断有序分化，从而初步形成了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、人口格局、地缘格局、经济格局和历史文化格局，加上六君子聪明智慧，善于兼顾私利和公利，故在治理国家时，自觉自愿、认认真真地践行公道公平、利人利己的“大德”，与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并非完全对立。

下面再简单谈谈孔子所论六君子之道，又如何与六君子无关，与夏商周历史无关，更多的是孔子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，根据人性自私自利不可改变的本质特点，而设计的一种理想的聪明的治国之道。

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，三代未必尽如孔子所描绘的那样美好，例如大禹商汤周武均传子不传贤、启灭有扈、商汤灭桀、纣醢文王、周武伐纣，《尚书》多有记载，孔子终身学习《虞书》《夏书》《商书》《周书》，不可能不知道。商人常以异族战俘为奴并殉葬，偶尔亦用本族人口殉葬，周代改用人偶殉葬，偶尔亦用活人殉葬，孔子曾痛骂“始作俑者无后”。殷末三仁均有志于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，而始终派不上用场，孔子曾受此启发，创造了“恕道”，以作为六君子“忠道”的重要补充。这些事实都说明，孔子的“大德”理论并非完全基于夏商周的历史事实，至少有一部分基于孔子自己对国家治理理想状态的政治方案设计，其目的并不是要忠实地还原三代历史，而只是以三代历史为初步依据，按照自己的政治智慧，给子孙后代设计一个理想的国家治理之道，这就是托古改制。

为了论证自己的政治思想，孔子经常托古改制。例如他为了强化贵族之间君臣父子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，一生反复提倡“三年之丧”，常说三代上至天王下至庶人，莫不为至亲至尊守孝三年。其实夏人受天文历法的影响，丧期不可能如此漫长；三代庶民百姓要是也像贵族那样守孝三年，全家恐怕早就饿死了。周代贵族改造了“三年之丧”，大大缩短了丧期，名字还是叫“三年之丧”，就是因为尧舜商代贵族的“三年之丧”，丧期实在太长，连贵族都受不了。这也是孔子按照“历史事实+政治理想”的方式，托古改制，论证自己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的可靠证据。

董仲舒很早就看出了孔子治国之道托古改制的这一特点，所以他说，孔子所谓六君子聪明智慧、公道公平、利人利己的治国之道，其实只是“孔子立新王之道”而已。这就是说，孔子根据三代历

史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智慧，总结并创造了六君子的治国之道，有部分历史事实作依据，更熔铸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智慧，其实是一种“新王之道”。董氏所论，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见识。

在孔子看来，天下为公的尧舜时代既然早已一去不复返，天下为家既然已经不可逆转，任何君子都不再可能完全不取私利，那么，君子只有认真真为国家民族、芸芸苍生谋取公利，才能自然而然获取私利，获取私利时又要取之有度，完全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，这便是后世君子最聪明最理想最有效的治理国家、造福苍生、利人利己的办法。孔子认为君子没有不想“立”不想“达”者，那么你先去“立人”“达人”，自己自然而然也会“立”也会“达”，这就是孔子悟透人性，悟透国家治理规律的结果。

汉朝至今，中国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国家治理者，都能按照孔子倡导的聪明智慧、公道公平、利人利己这一政治哲学治理国家，并大都取得了成功，从而使中华民族长期处在世界前列；而那些拒不按照孔子创造的六君子之道治理国家，不顾苍生死活、国家兴亡，极端自私自利、虚伪愚蠢的君子，则无不下场悲惨，国家苍生亦随之遭殃。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，孔子总结并创立的六君子治国之道，的确是“天下为家”时代最好的治国之道。

二、“小德”的具体内涵和自私本质

仁德君子“大德”的本质属性、主要成因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，上文已作简要论述。其他君子有哪些“小德”，本质属性如何，孔子为何称之为“君子而不仁者”，孔子师徒也作了理论总结。孔子师徒认为，大体而论，春秋君子有四种特别迷惑自己和别人的“小德”，均与君子巧妙牟取个人家族私利有关，而与造福苍生、治理国家无关。

其一，君子醉心于自己的小成绩小长处小名声，但对治理国家、造福苍生没有任何兴趣。

周人常将君子与小人对比，概而言之，君子小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经济地位、政治地位、受教育状况、政治理想人生追求四个方面。四者都高的就是君子，四者都低的就是小人即平民百姓，具体指农民、手工业者、商人和在官府打杂的下等人。小人生活艰难，时刻担忧自己的生存，无心治国，可以理解。不过，许多君子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，事实上也与平民相似，即使国家再乱，苍生再苦，只要自己的采邑安宁，家族的日子好过，也就得过且过，所以孔子将夏商周春秋君子分作两类：仁德君子和不仁不义的君子，也就是有公道公平、利人利己、治理国家“大德”的君子，和没有“大德”，仅仅略有小善，还自以为是的君子。孔子说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这个“仁”与子夏“大德”的概念一致，都用了“仁”的狭义，并不是说不仁不义的君子和平民百姓都一无是处，只是说他们没有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，利人利己的“大德”而已。贵族身上多少总有些长处，如果泛泛而论，也可称为“仁”，不过只是“小仁”“小德”而已。如：

子曰：“孰谓微生高直？或乞醢焉，乞诸其邻而与之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

微生高，《庄子》《战国策》均记作“尾生高”，他最有名的故事，一是本章所记载讨醋的故事，二是说他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，久等女子不至，水涨很高仍不走，最终被淹死。微生高当时大概在坊间的名声很大，其名声又反过来绑架了他，使他太在意自己的小名声，所以做出本章所记这样非常可笑的事来。孔子认为，“君子贞而不谅”，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微生高与女人约会守信而死，而不是为追求“大德”，为帮助天下苍生国家民族而奋斗到死，也只是刻板迂腐、不知轻重的可笑行为，并不是真正的仁德君子，并不值得称道。

子夏为莒父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，则不达；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很显然，“大利”指苍生之利，“大事”指治国之事；“小利”指君子个人之利，“小事”指君子闻达天下之事。孔子去世后，守孝期满，子夏就离开鲁国，远赴西河，担任了魏文侯的公卿。但孔子在世时，子夏还只是鲁国的一个小小的乡邑大夫，也就是县长，孔子却要求他追求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的“大德”。

孔子评价他人是否为“仁”，标准只有一个，就是是否有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的“大德”，他评价帐下弟子均采用了同一个标准：

或曰：“雍也仁而不佞。”子曰：“焉用佞？御人以口给，屡憎于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

孟武伯问：“子路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又问，子曰：“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

“求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

“赤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赤也，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

仁德君子深知治国艰难，故均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，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“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”，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，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但却不可以反推，将所有言辞木讷者均视作有“大仁大德”者。冉雍言辞木讷，并非巧言令色之辈，固然是其长处；子路有治理大国的才能，却并无治国理想和实际行动；冉求之才可以治理一个采邑（县）；公西赤之才可以参与国家外交，但他们都没有矢志不渝治理国家的伟大理想和躬亲实践，因此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仁者。三个“不知其仁”，都是“不仁”的婉辞。这里孔子所谓“仁”，也用其狭义，仅仅指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的“大仁大德”。从孔子对四位弟子的评价中可以看出，孔子认为，仁德君子应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那样，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，公道公平，利人利己，有“大仁大德”，做真正的仁者。君子的些许长处，些许成绩，些许名声，与“仁”这种“大德”相去甚远，故不可轻许为“仁”。

季子然问：“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？”子曰：“吾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”

曰：“然则从之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仲由先后做过鲁国上卿季康子、卫国上卿孔悝的总管，按照春秋礼制，同时也先后是两国朝廷的大夫。冉求，《雍也篇》《子路篇》均尊称他为“冉子”，说明他也做了华夏大国的公卿，自然也是大臣。但孔子为何说他们都只是做具体工作的“具臣”，而当不了“大臣”呢？因为他们都不能像真正的大臣那样“以道事君，不可者止”，这个“道”就是“大仁大德大道”，就是治理国家、造福苍生之道。可见孔子认为，“大臣”之“大”，是责任重大，使命重大。虽然担任了大臣，但事实上只能为国家做点具体工作，这样的君子只有“小德”而无“大德”，只是“具臣”而不是“大臣”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，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琏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

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焉，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

百工制作的所有手工业品均可谓之“器”。中国百工制度起源甚早，手工业非常发达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，舜帝时代就有主管天下百工的长官，名曰“垂”（亦作倕）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周代所有的方国均有主管百工的长官，华夏列国均谓之“工正”，楚国谓之“工尹”，都是工业部长的意思。百工制作的器物虽然“可观”，但君子却不能致力于此，君子的天职是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，而不是做某个具体领域的专家，故周代文献把君子的些许长处、些许优点均比作“器”，要求“君子不器”，要求君子“致远”。

其二，官员仅仅忠于职守，而不对国家尽责，不为苍生谋利。

官员有职守，忠于职守，做好本职工作，做一个正人君子，这是对官员最起码、最基本的要求，却不是全部的要求，更不是最高的要求。君子如果仅仅忠于职守，却无意于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，则只有“小德”而已，并无“大德”可言，并不是真正的仁德君子，而只是“君子而不仁者”。例如：

子张问曰：“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忠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

“崔子弑齐君。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之一邦，则又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清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

孔子称赞楚国令尹子文“忠”，只是说他忠于职守，与“忠恕”之道的“忠”含义不同。齐君荒淫无道，崔子忍无可忍，最终弑君。陈文子身为朝廷大臣，上不能匡君，下不能讨逆，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混乱不堪，朝纲不正，只是自我放逐，充其量只能算与昏君逆臣划清界限，为人为臣清清白白而已，故孔子只说他“清”，而远远不能算“仁”。这里两个“焉得仁”都是“焉得称之为仁”的意思。可见孔子认为，大臣仅仅忠于职守，为人正直，清清白白，却无意于治理国家，并无“大德”，只有“小德”而已，不算真正的仁德君子，不值得称道。

其三，仅仅恪守礼仪细节，却并不按照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的大礼，治理好国家。

夏商周春秋四代的政治规矩和宗教规矩，春秋文献笼统称之为“礼”“周礼”，虽然涉及天人关系、华夷关系、贵族平民关系等，但主要是规范贵族内部的君臣父子关系，也就是明确贵族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，规范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和获利行为。周礼的核心精神有二，一是君子的政治身份和宗教身份必须等级分明，井然有序，获利方式和尺度必须取之有度，不可僭越；二是君子均有治理国家、造福苍生的无限责任，不受任何地位、身份的限制。用现代话说，就是有限的权力和利益，无限的责任和担当，这种核心精神才谓之“礼”“周礼”。

为了界定君子的政治地位、宗教地位，于是就有繁琐无比多如牛毛经常叫人发懵的“仪”。“礼”的内涵和本质相当稳定，许多政治规矩至今未变，如今党和政府、人民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，本质上就是有限的权利，无限的责任。“仪”则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、环境的变化而随时发生变化。但在政治实践中，许多君子却往往只注重“仪”而忽略“礼”。例如鲁昭公出访晋国时，一举一动无不中规中矩，晋侯啧啧称赞，以为知礼。晋国大臣却不以为然：诸侯要实际掌握国家权力，切实履行国君对国民的义务，而鲁国“三桓”实际控制国家，已历数世，昭公并无任何举措，使国家恢复政治秩序，这怎么能算知礼呢？又如：

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本章孔子教导弟子，“礼乐”的关键是要理顺君臣父子的政治关系、伦理关系，而不是在“玉帛”“钟鼓”这些具体的礼器礼仪上，君子只是要借助这些礼器礼仪礼乐，按照周礼确认自己应处的位置，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如此而已。如果只注意礼器礼仪礼乐的形式，而忘了“礼”的本质，那就是为了手段，忘了目的。

子曰：“麻冕，礼也；今也纯，俭，吾从众。拜下，礼也；今拜乎上，泰也；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周人编织礼帽要用2400根线，麻线便宜但太粗，容易把礼帽编得太大，没有办法戴，编织起来非常费时，所以礼帽反而价格昂贵；蚕丝原材料较贵，但编织容易，省时省力，所以礼帽反而便宜。以前君子多戴麻线礼帽以示节俭，谁知现在反而花费更多，所以孔子赞成大家对具体的礼仪进行改革，改戴制作方便、价格低廉的蚕丝礼帽。贵族戴什么质地的礼帽，不是要紧的事情，所以孔子觉得无所谓。
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蒺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；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按照周礼，君子为官应该恭恭敬敬，认真工作，所谓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是也；战争事关天下兴衰，国家存亡，将士死生，君子应该谨慎小心，不可“暴虎冯（凭）河”，应该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；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君子应该效法商汤周武，“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”。但若不能真正理解“礼”的本质，只知道亦步亦趋遵守礼仪的细节，就会带来“劳”“蒺”“乱”“绞”等一系列的问题。

其四，君子仅仅洁身自爱，修身齐家，而不顾国家兴亡，苍生疾苦。

君子有采邑，经济上很富有，政治上又身居高位，均受过良好教育，却不管国家成败、百姓生死，只顾一己私利，仅仅做一个正人君子，并非真正的仁德君子，没有“大仁大德”，也是“君子而不仁者”。

宪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

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”，说明君子的个人修养相当不错，但仅此而已，并非“大仁大德”。“仁则吾不知”是“不仁”的婉辞。中国从宋朝开始出现一股很不好的风气，君子只顾洁身自爱，谋求心理上的所谓完美无缺，而对国家兴亡、民生疾苦缺乏兴趣。表面上看，他们好像是正人君子，但按照孔子的观点，这样的君子只是“君子而不仁者”。不管他们如何自我吹嘘所谓“心性之学”，他们本质上只关心自己，不关心天下苍生，只讲私利，不讲公利，只重视所谓内心世界，不重视建功立

业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而且这种洁身自爱的风气，又与繁琐无比的礼仪结合起来，到了明清时代甚至演变成了假道学，伪君子，贻害天下不浅，至今国家仍然深受其害。

“君子而不仁者”的以上四种“小德”，虽然表象各异，程度不同，但有三个共同特点：

一是孔子所举都是春秋君子的例子，三代君子的例子一个都没有。这说明孔子对春秋君子的道德水平有一个基本判断：真正愿意治理国家、造福苍生的仁德君子很难见到，略有小善还自以为“仁德”的“君子而不仁者”倒不少。

二是这些假君子都多少有些长处，泛泛而论，亦可勉强称之为“仁”，不过都只是“小仁小德”而已，本质上都极其自私自利。

三是君子的无数“小德”，均与仁德君子治理国家、造福苍生的“大德”毫无关系，也不可同日而语。由于上述四种“小德”毕竟也是小善，很容易让那些自私自利、胸无大志、没有公心的君子，陷入自我欣赏、自我迷恋之中，甚至有意欺世盗名，所以孔子反复告诫帐下弟子，不要被这些“小仁小德”弄得晕头转向，不要为此而沉醉其中。孔子所谓“小不忍，则乱大谋”，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这个“小”主要指上述四种“小仁小德”；“大谋”则指仁德君子治理国家，造福苍生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。《贞观政要》尝云：“小仁者，大仁之贼也”，这是对孔子“小不忍，则乱大谋”的很好解释。

“君子而不仁者”的“小德”的具体内涵和本质属性，大约如上。

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，孔子一派还认为，仁德君子亦有“大德”“小德”之分，他们在“大德”上会毫不含糊，但在“小德”上也会犯错误，有缺点。这很容易与“君子而不仁者”的“小德”问题混淆，所以需要辨析一二。仁德君子也是常人，自然会犯错误，有缺点。姑且不论不知提前防范兄弟管叔、蔡叔谋反，以致一度使周家天下风雨飘摇的武王、周公，和贪得无厌、僭越礼制的管子，（《论语·八佾》《论语·宪问》）孔子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孔子一度急于为官，甚至曾想到鲁国叛臣公山弗扰和晋国叛臣佛肸那里去做官，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这类语录《论语》照收不误。后世学者或责怪曾子门徒不该把这两章编进《论语》，以致损害了圣人的形象，或辩解说孔子只是为了试探弟子而已，并非真想去叛臣那里。其实两种说法均不可取。鲁国吴国为兄弟之国，鲁昭公娶吴女为妻，违反了“同姓不婚”的周礼，孔子不得不“为尊者讳”，硬着头皮说鲁昭公“知礼”。当他知道自己因此被陈司败批评之后，坦然接受批评，而且高兴地说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弟子子游做了鲁国武城大夫，用礼乐教育当地人民，孔子戏称“割鸡焉用牛刀”，但当子游正色以对时，孔子连忙认错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孔子弟子亦如此，宰我、冉求、子贡、子路等都被孔子责骂过，弟子都认为老师骂得好，都把老师骂自己的话记录下来，并且都交给曾子师徒，最后都被收入《论语》，流传后世。《论语》的记录者和编辑者们这样记录和编辑孔子师徒的语录，反映了孔门一个基本观点，真正的仁德君子，“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”。仁德君子“小德”可能会有“出入”，但“大德”不可能也不应该“逾闲”；而“君子而不仁者”的“小德”可能完美，却完全没有“大德”可言。

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，故孔子创造的“新王之道”备受冷落。及至大汉，国家一统，需要长治久安，永续发展，而董仲舒又发现孔子治国之道的确聪明智慧、公道公平、利人利己，于国于民、于当今于后世均极其有利，故力主推荐之。汉武帝接受了董子的提议，此后孔子治国之道，遂成为大汉至今国家治理的核心理论，中华民族最近两千多年来整体上能够长足发展，领先世界，与孔子治国之道应有密切关系。

治国之道是中国最古老而又最年轻的学问，五帝三代草创，孔子总结创新，战国至今不断发展，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理论核心，又是政教文史哲法等许多衍生学科的理论渊藪和指导思想。因此，准确地把握孔子治国之道的理论精髓，对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，其意义之重大，亦不可小觑。



孔子研究院

联系电话 13562796608
本院地址 山东省曲阜市大成路9号
联系QQ 25319478
友情链接：中国曲阜 | 中国济宁

